

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

聚焦重大考古发现与前沿研究成果

讲述博物馆里的红色故事

余玮

日前，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郑州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主题，进行主题报告和研讨。

知古鉴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学术论坛，“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已于2017、2019年在郑州成功举办两届，成为最新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展示和交流的优秀平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次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共有全国各地50多家文物部门、考古科研机构、高校代表参会，共有12位专家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报告和深入交流，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等，异彩纷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论坛上表示，100多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筚路蓝缕、不懈努力，为中华文明探源获取了丰富的历史考古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考古发现证实，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为当代学者知古鉴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也表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缩影。包括文明起源阶段在内的众多遗址，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加以充分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未来，考古工作者将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田野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大对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全面提升考古成果面向全社会的科普和宣传。

展示交流：呈现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郑州商都书院街贵族墓地确认是一处中商早期具有‘兆域’性质的贵族墓地，这对于晚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兆域制度、贵族陵墓丧葬体系而言具有明确的开创性。”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表示，M2是郑州商城目前发现的级别最高的贵族墓葬，其出土青铜器是郑州商城内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的，为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



本报记者 付裕

▲郑州州桥及汜河遗址考古工作现场

资料，其出土的金质覆面为探讨西南地区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来源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这在早、中商文化的研究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遗址连同其附近的多组夯土建筑基址，填补了郑州商城内城东东南聚落结构形态的空白，在夏商文明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徐姚遗址地处山东腹地，遗址核心区总面积约400平方米，有火葬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遗物1000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益超在简述徐姚遗址的考古收获时表示，该遗址内红烧土遗迹反映了古人从适应自然走向改造自然的重要跨越，为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及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赵超讲述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的基本情况。据了解，四台遗址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石器时代早期中期遗址，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四台遗址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证明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小雷在对安徽凌家滩遗址及其近年来的考古新进展介绍时表示，以徽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以及玉石器、石雕残块的出土，丰富了对凌家滩文化内涵和信仰体系的认知，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史前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是距今5000年左右黄土高原上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仅九台及环绕九台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九台之内有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布局严整的宫城，5000年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宫城建筑，还发现了大量制作水平很高的白陶、黑陶等器物和大量的炭化水稻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小宁表示，南佐遗址内红陶、绿松石、朱砂、双腹盆、圈底缸以及大量水稻等的发现，表明南佐和长江中游、海岱地区甚至更南方广大地区存在广泛联系。

“山西西武成遗址与殷商大墓外圈，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挤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圈为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障壕。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城年代的春秋时期秦陵园，在各组秦公墓周围有障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障壕的确认，将此规则上推到商代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在对2021—2022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新收获进行研究中发现，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是一处大型文化聚落，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境构成，其体量相近，时代相同，这种独特的聚落形态，系秦省庄文化首次发现。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境聚落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表示，太平遗址的新发现弥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区域文明化进程探索的薄弱环节。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的密切联系表明太平遗址已经具备了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奠定了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200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砦城址、大型建筑、官殿区进行发掘，在遗址年代、遗址级别、多学科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2000年至2021年发现铜器材料17件，为

研究早期铜器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表示，新砦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之一，其脱胎于龙山文化晚期之中，继承创新融合。新砦文化在铜器制作、礼乐建制、官城设施、文化艺术上具有诸多开创性，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在中原龙山文化走向没落之际，作为新兴势力为夏王朝全盛打下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的布局。遗址新发现东西向和南北向大道各一条，与此前在中心区发现的两条东西向大道和两条南北向大道，构成了多网格的布局形态，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都邑规划制度、官城宫室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以及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被商周王朝继承，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被后世延续发展。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遗址揭露出丰富的史前及夏商周等时期文化遗存，其中以商代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西吴壁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晋南地区以往未见二里岗下层阶段商系墓地的空白，为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的源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田伟在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研究中发现，墓地出土青铜器种类丰富，与之共存的陶器时代特征明确，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断代确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将极大促进早期青铜器领域学术研究。

“2021—2022年，新探明并确认两个围沟，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圈，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挤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圈为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障壕。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城年代的春秋时期秦陵园，在各组秦公墓周围有障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障壕的确认，将此规则上推到商代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在对2021—2022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新收获进行研究中发现，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从目前考古工作来看，西头遗址发现的西周大型城址、围沟墓地及多座甲字形大墓，无疑显示了该遗址的高等级特征，遗址商周遗存有内涵丰富、时代延续长、聚落规模大、墓葬等级高等特点。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工作，拓展了泾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局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海峰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合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建立了从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要标尺，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研究员顾万发表示，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围绕着中华民族形成与起源这一重要主题，进行了跨学科、多领域、多维度的交流和研讨。在本次会议上，呈现出最新的考古发现，其中很多是重大的学术问题，对填补空白、推动考古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艺、编织、雕塑、年画、玩具等门类。加之展览说明书、明信片、纪念章及张光宇的设计图、图书文献和研究图表等，共计约200件套展品。分为“致敬1953”陶瓷、漆器、织绣印染、年画、杂项6个单元，并设“文人意趣与雅俗共赏”“民间造物与吉祥文化”“新中国、新题材”3个独立专题。展品既有造型雅致、工艺精湛、图案精美的民间收藏或组织选送的作品，亦有造型朴拙、聚焦日用、工艺朴实的民间市集收购的产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展览总策划杜鹏飞表示，此次展览中的展品呈现出一种共性：作者热爱生活，观察入微，充分掌握材料与工具的特性；作品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与鲜活的生命力，体现了健康优美的民族特色。展览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的历史脉络与审美风尚，梳理了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手工与机器并存的发展之路。展览将为复兴传统文化、振兴传统工艺、促进工艺美术教育发展与学科建设，提供一种温故知新的视角与视野。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珍贵馆藏“致敬1953”

本报记者 付裕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珍贵馆藏“致敬1953”

日前，“致敬1953：馆藏‘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作品选粹”展览开幕式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颁奖仪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才大颖宣读《关于设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的决定》及《关于授予常沙娜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名誉会长的通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向常沙娜颁授“名誉会长”证书。

关于此展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策展人郭秋惠介绍，1953年，新中国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举行，包括陶瓷、染织、刺绣、金属工艺、漆器、

编织品、雕塑品及木偶、年画、剪纸、玩具等工艺品类，规模宏大，品类丰富，展品精美，影响广泛。可以说，1953年是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关键之年。

为筹备“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当时的文化部组织了全国工艺美术调查。该展览的筹备促进了产区恢复、教材出版与师资培养。展览举办的同时，召开南北专家、各地工作人员的座谈会，促进了工艺交流。1954年展览结束后，部分展品成为随后4个工艺美术国际交流展的重要展品，多位展览筹备者带队组织出国展览，促进了国外工艺调研、文化交流、著述出版和工艺美术品的出口换

汇；部分展品划拨给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助力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时隔70年，为致敬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教育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致敬1953：馆藏‘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作品选粹”为题举办展览，展品基础与学术脉络均源于1953年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

据了解，此次展览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1000余件套“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展品中选出170余件套，包含陶瓷、漆器、织绣印染、金属工

又到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近些年来，红色旅游明显升温，红色博物馆持续火爆，许多人出游时不忘打卡。不少博物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展陈纷纷“上新”，迎来八方来客。

文物聚集红色精神富矿

北京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聚集地和传承地，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革命史料和红色印记。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是无数中国人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这里恢复陈列或标注了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曾在红楼工作过或讲学的房间、教室，展出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文物和图片，生动地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

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留存下来的红色文物成为了历史最好的见证。坐落于上海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百年前曾是来自五湖四海的13名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聚会地。他们在这里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改变。

红色博物馆所在地不但拥有宝贵的红色历史遗址，而且还拥有众多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是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值得不断挖掘的弥足珍贵的精神富矿。

地处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几乎每个开放日都会有各类团体来这里进行教育活动。该馆主展馆内详细介绍了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并展出了许多珍贵文物。例如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中使用过的勃朗宁手枪，自卫手枪一直被其携带在身边，用以自卫防身。见证了聂荣臻的峥嵘岁月。自1948年10月30日至1949年1月22日，刘后同任傅作义身边陪伴了85天。在此期间，他每天都将发生的主要事件记录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北平和平谈过这段历史真实地传给后人，刘后同将85天日记整理成册，命名为《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主要记载了其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并真实记录了傅作义的思想波动，以及刘后同为促成和平不懈努力以致操劳过度致使右眼失明的故事。平津战役纪念馆中有很多展品都是当年参与过平津战役的将帅或其亲属赠予的，其中还不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坐落在天津市水上公园风景区一侧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带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光环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藏品丰富，国家价值同样弥足珍贵。

红色博物馆不仅是简单地印证历史，透过一座座纪念馆和其中的一件件真实的红色文物，让观众能看到红色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有着强烈的历史现场感，能使民众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这段历史所蕴含的精神力量。红色博物馆及其红色文物是红色精神的物化载体，带来的直接感动是其他宣传教育手段所不能代替的。

共同烘托“中国红”

红色博物馆承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进的光荣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红色主题陈列展览，有以红色文物资源为主体的基本陈列、常设主题展览、纪念性展览和临时展览。有的依托革命旧址或革命事件发生地建馆，有的立足当地革命人物诞生或牺牲等红色资源建馆，有的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受众进行分众化、特色化教育而建馆。因此，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等事件类博物馆，也有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赤壁142烈士群雕陈列馆等专题博物馆，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重庆岩石革命历史博物馆、西柏坡纪念馆等红色地标类博物馆，还有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陈云同志纪念馆等带纪念性质的故居类博物馆，也有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董存瑞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等红色专题博物馆。

这些红色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博物馆以物证史、以物叙事，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注重把宏大叙事与细节呈现、场景再现结合起来，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尊重历史，还原真实。

许多城市用好当地红色资源，打造精品陈列。今天，红色博物馆正在成为一些城市的红色名片。很多人愿意为了一座红色博物馆赴一座城。

武汉市整合着辛亥首义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等，成

为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和独具标识性的城市文化符号。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武昌都督府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山舰博物馆、武汉“二七”革命纪念馆……红色博物馆集聚的武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之一墙之隔的，是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同志旧居等著名革命历史遗址，它们组成了“武昌红巷片”革命遗址群，如今成为武汉市红色旅游的亮点区块，每到节假日游人如织。

山东省党史陈列馆、济南战役纪念馆、莱芜战役纪念馆……这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仅为泉城济南增添了一批红色人文景观，为民众提供红色文化教育场所，而且带动了周边的英雄山、解放阁、豹岗山、茂岭山、大峰山等红色旅游资源，人们渐渐发现这里原来是文物古迹和自然风光荟萃之地。

孕育了一批批爱国志士的南粤大地，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作为全国革命文物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种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可移动的珍贵革命文物4500多件(套)，以及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处。

许多城市的红色片区已经纳入当地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在建设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切实保护革命文物，运用高科技手段，努力提高展陈设计水平，使陈列展示更加丰富，留住许多年轻观众。特别是一些红色博物馆注重把“物”与“史”的侧重点，在讲“物”的同时，更注重“史”，史作为展示的中心，物配合史，为突出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特性来选用，以“物”说史，渐渐让博物馆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课堂，成为民众日常出游的热门选项，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瞻访、学习的热地。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市民只要通过手机“扫一扫”的功能，就能立即获得二维码语音讲解服务，从海量馆藏资料中了解到景点和文物背后的精彩故事。除此之外，3D影像和AR、VR技术的运用，则可以让参观者“参与”到恍如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技术团队利用三维技术精心制作并还原了“重庆大轰炸”期间渝中半岛的场景，并制成一部3D短片，让市民游客可以亲眼看到山城厚重的红色记忆重现眼前。

在南昌革命纪念馆，实景还原的“嘉兴火车站”，使参观者恍如穿越时空隧道的战争场景及大量革命文物，生动再现了当年中央红军声东击西、突破国民党大军包围，踏上胜利征程的场景……这种生动鲜活、真实可感的呈现方式，让很多人主动走进红色历史，接受红色教育，争当红色传人。

近些年，在互联网和科技加持下，不仅更多红色博物馆选择了更亲民、更时尚的展览叙事方式和展陈形式，也让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变得“可触达”，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以前红色博物馆更多是敬畏的心理，很怕自己看不懂，没文化，不敢走进去，但是现在展板、语音讲解都特别通俗易懂，可以反复看反复揣摩。”一位观众如此说。她退休后爱上了逛红色博物馆，一有时间就“泡”在博物馆里。

在全媒体时代，年轻人的认知特点、接受习惯、审美情趣都有了很大改变，单一的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让年轻人进入红色博物馆，学习了解党史国史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重大战役、重要人物，不仅是一种“亲历”，更是一种触摸、一种对话、一种交融，必定会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因此，一些博物馆不断用新技术丰富听觉上的感受，增加一些动手环节，提高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感。有的博物馆创新陈列展览与宣传推广，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云”展览传播体系，增强陈列展览辐射力、影响力，不断提升代入感、沉浸感、真实感。当然，内容为王，科技只是一个手段，要传达和传播的内容才是最主要的，红色史实背后的精神内涵挖掘得好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先辈们抛洒热血的地方，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一座座博物馆已成为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使民众能够循着故事来、带着信仰走，真正获得心灵的净化、灵魂的洗礼。红色主题旅游不仅打造着中国特色的旅游品牌，还促进旅游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